

语言翻译问题 论汉代和亲公主的

□李新霖



“和亲”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始于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0年经历了凶险的白登之围后，开始听信刘敬所进的和亲之计，并开始以公主妻以蕃国国君的做法来贿赂敌国，从此揭开了华夏公主的和亲历程。至于和亲的作用，在《史记·刘敬列传》里已说得非常明白：“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之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自西汉实行了和亲策略之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亲渐渐地成为结交军事同盟、分化瓦解异族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并形成了固定的和亲礼节和固定的和亲模式。学者崔明德在《汉唐和亲研究》中统计云：“西汉与匈奴和亲13次，与乌孙3次，东汉与匈奴1次。”可见汉代主要的和亲对象是匈奴与乌孙两国，而在这些和亲者里面，真正留下生平事迹的只有三位，即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王昭君。

汉代时的匈奴，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越葱岭，地域辽阔，国力强悍，匈奴国所使用的语言，学者们一般认为是“叶尼塞语”。叶尼塞语系是分布在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流域的一个语族，包括六种语言，古代的匈奴与羯族都使用这种语言，乌孙是受塞种人影响很深的操印欧语系的古代民族，乌孙的语言与匈奴的语言有一定的差别。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同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语言差异非常大，那么在公元前两世纪前往匈奴国与乌孙国和亲的公主们，是如何解决她们必须面对的语言翻译问题的呢？

一、语言不通时期的艰难时期

《汉书·西域列传》有云：“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可见当初西汉与乌孙的和亲是想结成汉乌联盟来共同抵御强劲的匈奴。因为汉时的匈奴不仅侵扰汉王朝，同时还控制着包括

乌孙国在内的西域诸国，为了抗击匈奴，乌孙国就成了西汉争取的重要力量。细君公主当是第一个和亲乌孙国的女子，出行于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朝这种以“贡女”方式来讨好异国国君的方法已流行了近百年，先后已有十几位没留下姓名的汉宗室女子进入匈奴国和亲，但对于乌孙国的和亲，汉朝王室显然还没有完全成型的规则，起码对乌孙国的民俗及语言还没有十分熟悉，细君就在这种条件下仓猝出行，所以就产生了因“语言不通”而“悲愁”的艰难，从而有了“悲愁诗”的问世。很显然在语言问题没有解决、生活习惯又严重不同、夫妻年纪相差甚远、感情冷漠的处境之中，细君的生活境况只能是“自治官室，置酒饮食，岁时一再与昆莫会”。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细君虽然人在乌孙，但生活上仍保持着汉人的习俗，甚至连居住空间都与老年的乌孙国王隔绝开，只是“岁时一再与昆莫会”而已，故此种境况传入汉宫，“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因此可以得知，此时的语言问题成了细君公主生活里最大的障碍，也是她真正进入乌孙国政治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和亲使命的最大障碍。

二、配备陪嫁的语言翻译人员

也有学者认为，细君公主的这首“悲愁诗”只是初入乌孙时的作品，在之后长年在乌孙的生活里，她一定会掌握乌孙语言，从而解决语言障碍，当然这需要一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实，真正解决和亲公主们的语言翻译问题的是随嫁的和亲使团成员里的翻译工作者，关于这一点，学者崔明德在他的《中国古代和亲史》里有这样论述：“据史书记载，到匈奴、乌孙、柔然、突厥、于阗、宁远、回纥、高昌的和亲公主的随从者，既有服务性的侍者、宦者、属官、媵，也有医生、手工业者、设计师、建筑工人、乐师、厨师、文化教员等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学者阎明恕先生《中国古代和亲史》里指出：“和亲公主外嫁边疆，往往带去了大量财富，但是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大量文化书籍、先进技术、中原文化等如音乐、诗歌、绘画等，这些都是以参加和亲的随嫁人员为载体。”“这多达数百人的和亲使团，他们将留下与和亲女一起常驻于和亲国，形成一个各行业专家的技术团队，既为和亲公主服务，又为宣传汉朝文化做贡献。在这些团队里，就有一些精通异国语言的人物，他们的作用就是为和亲公主进行日常的语言沟通工作。”

这类服务于和亲公主的语言翻译工作者应当是由宫中阉割后的男性或宫中有文化的女性来充当，如汉文帝六年（前174）时

“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史记·匈奴列传》记云：“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为傅。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中行说之所以被选中辅助和亲公主，当然是由于他的通晓异域语言的才能，中行说为燕人，“燕”指的是中国北部的燕山一带，因为燕山距离内蒙古不远，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匈奴作战时常出没的地区，所以中行说可能幼年时受到匈奴语的熏陶而学会了匈奴语言。身处宫中的中行说深知此行就会久居匈奴，不可能再回故乡，所以才发出了“必我行也，为汉患者”的怨言，从中行说的这段话里可以得知，中行说是有着沟通汉语和匈奴语言能力的，所以他预言自己将要利用这种能力去帮助匈奴，成为汉朝的敌人。果然，当中行说至匈奴国之后，他受到匈奴王的亲善对待，于是他献计献策，力劝匈奴王不要贪图汉朝的丝物和食物，更不能在风俗上被汉人同化，“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中行说还向匈奴王建议云：“汉遗单于书，牋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牋，及印封皆令广大，据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这说明中行说不仅掌握了匈奴的口语，还精通汉文字和匈奴文字，可以熟练地为匈奴起草文诰，好在气势上压倒汉朝的使节。就是这个能言善辩的中行说，在匈奴老单于去世之后，仍得宠于年轻的单于：“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

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国时，其和亲团队里有一位女性“侍者”名叫冯嫪，属于和亲使团的“侍御”。《汉书·西域列传》评论冯嫪云：“初，楚主侍者冯嫪能史书，习事，尝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从这些文字可以分析出，冯嫪这个女性不仅精通历史，而且有政治头脑和语言能力，是个出色的外交人才。《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注云：“师古云嫪音了，慧也，以为名。”对于“习事”的说法，胡三省注云：“内省汉事，外省

“在本世纪的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1]。他曾经有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是国共两党的元老。他参加了历史上国共两党多次谈判,特别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谈判。他极力促成两次谈判并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赢得了“和平老人”的尊称。

一、国民党要人 共产党朋友(发起者)

邵力子1908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是国民党中元老级人物。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介石中山舰临难护驾孙中山,使邵力子对蒋介石产生了敬佩和信任。1925年,邵力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他深得蒋介石信任。在蒋介石日记中曾有“与力子商议一切”之语^[2]。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一直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

同时,邵力子又是共产党发起人之一。1920年,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跨党”参加了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后,他转为正式共产党员。他具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身份。1926年8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接受陈独秀、瞿秋白的建议,退出共产党,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员。邵力子尽管退出了共产党,但与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比较

友好,同共产党上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有联系。1936年,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毛泽东曾写信给邵力子劝其合作抗日。他也曾顶住压力批准出版由斯诺笔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使国统区人民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了较为真实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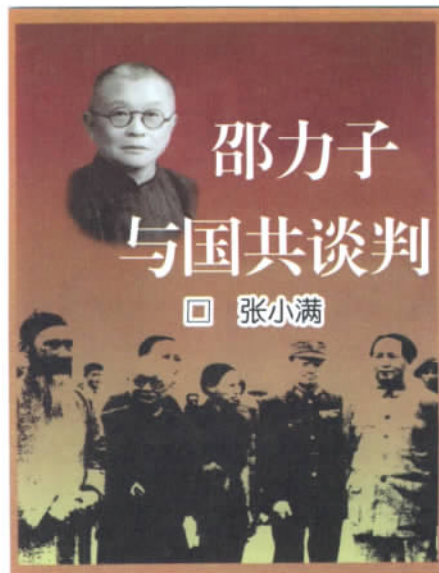
邵力子与蒋介石同是浙江人,蒋介石用人之道的“三缘”(血缘、学缘、地缘)中占其一缘。国民党内派系复杂,而“他却代表着国民党内‘无党无派’,他不属于任何小集团”^[3],蒋介石也了解邵力子与共产党的渊源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但在蒋介石看来邵力子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也不会拉帮结派的文人。他“江南才子”和“浙江二邵”(指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邵力子、邵飘萍)的名声和有口皆碑的人缘让蒋介石十分信任并重用他。长期以来,尽管邵力子在“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有严重分歧,但他对蒋是忠诚的,蒋介石也深信他的才华与口才,加之他与共产党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国共两党重大谈判中,蒋介石都会让邵力子参加。李宗仁也是看中了邵力子资深身份和在国共两党中的影响,对其十分重用。当李宗仁组织国民党北平谈判代表团时,首先考虑的是让邵力子任首席代表,只是由于邵力子的坚辞,才改为张治中。

邵力子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使他成为国

共两党谈判代表的最好人选,既为国民党所信任,又为中共所接受。

二、斡旋折冲 求同存异

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的重庆谈判,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围绕着怎样实现和平统一,国共两党矛盾尖锐,斗争激烈。邵力子认为应该实行民主统一,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他对国共谈判寄予殷切期望,极力促成并推进国共谈判。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虽是耍阴谋,但邵力子却对谈判充满希望。毛



西域诸国事。”这位精通乌孙语和乌孙风俗的冯嫄后来嫁了乌孙的大将军,“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冯嫄在乌孙国的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她时常代替解忧公主出使周边国家,代表解忧公主向周边国家送去问候和礼物,表达汉王朝对他们的关怀,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敬爱。当乌孙国遭遇动乱之时,也是冯嫄出面调解,化险为夷。“冯夫人锦车持节,语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而还。”很显然,冯嫄的身份就是解忧公主的语言兼外交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和亲使节团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群体,只有这样,和亲女才能更好地进行一些有利于汉王朝的活动,促进汉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保持一种和谐的局面。

三、组织语言的培训

《汉书·西域列传下》有云:“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原聘马、骡各千匹。’……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

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这又是一次乌孙请求和亲的事件,乌孙国君凭着新战有功,再次请求尚汉公主为其儿媳,并许下了重聘,汉宣帝亦欣然应允。大概是因为经历了细君公主的语言不通的“悲愁”时期,使汉王朝认识到出使人员的语言培训的重要性,于是才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和亲使团进行语言培训。“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乌孙语培训活动,参与学习的人是“置官属侍御百余人”,就是此次欲随相夫公主的和亲使团,数量是百余人,可见这个和亲使节团的规模。

“舍上林中”的“上林”指的上林苑,这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在秦代的旧苑址上扩建而成,上林苑横跨长安、咸阳、周至、户县、蓝田五县,纵横300里,有霸、产、泾、渭、丰、镐、牢、橘八水出入其中,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有供游憩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为太子设置招宾客的思贤苑、博望苑等。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特别是昆明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开凿,周长40里,

汉武帝在此训练水军,又造楼船高十余丈,据《三辅故事》记载:“昆明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濯歌,杂以鼓吹。”把培训相夫公主和亲使团的地点设在上林苑这样的豪华场所,生活待遇之高,也可看出汉宣帝对此事的重视。所以在培训结束、相夫公主主要出行之前,上林苑举行了豪华的歌舞联欢活动,“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汉宣帝此举是对这次和亲活动的重视,也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外交活动,不巧的是相夫公主的这次和亲因“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陁泥靡代为昆靡”而终止,但这种大规模的语言培训活动却扎扎实实地起到了提高和亲使团的语言翻译能力的功效,不仅减少了和亲公主与西域诸国的语言障碍,亦为解决今后公主和亲中的语言翻译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模式。

参考文献

- [1]余太山.西域文化史[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
- [2]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 [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M].人民出版社,2005.
- [4]Lawrence Venuti.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作者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